

村妇教子，那些往事

舒飞廉

小时候在我们那个小村庄，也流行着蛮多的洗脑神曲，比如说：“伢们的，出来玩，莫在家里打牌寒！”还在吃晚饭的孩子侧耳听到，就会将筷子一射，往月光地里飞跑去参加游戏，免得在被窝里横遭“打牌寒”的噩运；“戳了燕子窠，长成癞痢哥！”哈哈，那些下意识地将手往头上捂的谁谁谁，春上不是搞定了燕子窠，就是与人家麻雀鸦鹊惹上过；“伢的妈，会做粬，一碗‘格致’一碗沙！”猛听到同伴对着自己唱这一出，绝交的节奏啊！小孩脸涨得通红，头上的癞痢格格铮铮如爆北斗七星阵（如果有的话），浑身也会像打牌寒似的，气得左右直打摆子。为么事？这个“格致”可不是国学大师朱熹同学的格物致知，而是由身上搓下的泥垢甲甲，周伯通哄骗黄河四鬼吃的“解药”。妈妈和面做粬，又是泥垢又是沙石，这个婆娘也一定是又懒又脏，又笨又馋。亲娘被如此羞辱，是可忍孰不可忍。走！一场约架在所难免，马上就要去稻场的草垛边见分晓。

不过话说回来，扎一草屋把子，在灶屋里生火煮饭，喂猪烧菜，布筷涮碗，伺候一家老小加两头猪的一日三餐，的确是主妇们的天职。做得好，干净灵醒，将灶屋弄得像跳秧歌的场子，“厨房里的舞蹈家”，自然是人人点赞，被表扬说“飞廉弄的个屋里人好”。做得不好，菜咸得像打死卖盐佬，冷汤糊饭，按下葫芦浮起瓢，伢们下学喊饿，双猪在栏里跳跟哀嚎，男主人暴走，家暴可耻，打老婆犯法，但飞廉的脸也会拉得比紫茄子还长。由煮新鲜饭到炒现饭，由熬粥到煮烫饭，由粬粬到糯米，由酿米酒到打糍粬炸年糕，吃厌的是鱼肉，吃不厌的是白米。但米饭是日常，是生活，面食却是远方，是诗。稻谷早晚两季，麦子却是一年一熟，三月荠麦青青，四月扬花吐箭，五月麦刈青，六月秧场见。艳阳天摊晒干的第一批明黄光滑的小麦粒，加工出洋洒洒雪白的面粉，女人们舀几瓢，撸起袖子，调水和面，延延展展，土屋蒸发，不久面包的香气被南风由村南吹向村北，唤出全村小孩与狗子的口涎。揭开锅，白面里有烫得热的拳头大，左手挽右手交替拿着，烫香软和，又筋劲细密。尝新麦，吃面粬，入夏第一快事，不亦快哉！蒸面粬、糖三角、花卷、包子之外，取擀面杖啪啪响，在簸箕里擀出面饼团团如月，薄薄似纸，可以包馄饨饺子，炕焙薄片，切出面条比轧面机轧的还细。或者烧一锅菜籽热油，炸麻花、荷叶、撒子、油条。一家的屋顶下，缸里摸摸有小麦，灶前扎围裙有巧妇，白日黑夜，寒来暑往，春夏秋冬，老人小孩，近亲远戚，日影就变得好混多了。

会做粬的妈，也是能教孩子的，我觉得孟岳母们，迁居识字之外，一定会有一手过硬的白案手艺，能够将簸箕当砚台，擀面杖做毛笔，像做文章一样，蒸出馒头如云，切出白面如丝，煮出饺子如梦，勤劳的母亲，多半会养出能干的儿子。我特别喜欢本地一个名叫《村妇教子》的民间故事，说的是寡母子二人，儿子长大出外读书，想念母亲冬夜回来，母亲说你的书都读通了，字都写好了？儿子点头称是。母亲让儿子取出笔墨纸砚铺好，她取出簸箕面粉擀面杖，噗地吹灭油灯，让儿子摸黑写字，她摸黑做饼。鸡鸣三更，母亲重新点亮灯，儿子写的字鬼画桃符，歪歪倒倒，母亲炕的饼子方方正正，馨香可口。母亲将饼子包进包袱，命儿子披星戴月，在清霜与鸡鸣里，连夜回到学堂。后来母亲上参加考试，乌云狂风吹灭了皇帝屋里的大灯，那孩子像摸黑做饼的母亲一样，摸黑写出了锦绣文章，金榜题名，娶公主，入赘宰相府？这个就不晓得了。

虽然两个儿子念书念到博士硕士，我母亲却是文盲，她老人家认得的百十个宝贵的字，多半来自麻将牌与漫长的电视肥皂剧的字幕。我弟弟在南

宁，我在武汉，每一次母亲独自往返这两个城市的时候，我们都如临大敌，得将拎着的土鸡蛋的老人家迎送到动车车厢的编号座位上，搞定ABCDEF，才算是大功告成——在城地铁、智能手机、符号化的都市里，一个文盲老太太张皇失措，活脱

长眉。第五回有酒名为“万艳同杯”。警幻向宝玉解释道：“此酒乃以百花之蕊，万木之汁，加以麟髓凤乳酿成，因名为‘万艳同杯’。”杨宪益和戴乃迭的译本将其直译为“Ten Thousand Beauties in One Cup”。霍克斯将其意为为“Lachrymae Rerum”,意为“万物之泪”。这出自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《埃涅阿斯纪》，维吉尔以Lachrymae Rerum来称呼埃涅阿斯流出的汇集了众多特洛伊人痛苦的眼泪，熟知罗马史诗的读者自然会产生产联想。由此可见，两个英译本对一些语词的翻译各有千秋。

颜福庆在武康路

李天纲

如松早逝以后，永京成了家庭支撑，颜氏兄弟的成就，都受了他的悉心培养。颜永京（1838–1898）在1854年出国留学，回上海当了圣约翰大学的监院（校长）。他又把儿子、侄子再送去美国留学，全都回国服务，成就了后来上海滩上十分隆重的颜氏家族。

颜福庆（1882–1970），出生在江湾镇，6岁丧父后由颜永京抚养。1899年，颜福庆进入伯伯颜永京当监院的圣约翰书院学医学；毕业后，又进入舅舅吴虹玉创办的同仁医院当医师。1906年，颜福庆考取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，插班到二年级，并于1909年就以优秀生毕业，是第一个受完美国训练的亚洲人医师。1910年，直接进入耶鲁大学在湖南创办的湘雅医学院，担任院长；1927年，因才华出众、成绩出色，又被具有国际水准的北平协和医院聘为院长。然而，颜福庆最想做的事情，是要在上海办一家第一流的华人医院和医学院，与天主教的广慈医院，新教的仁济医院一比高下。

虽然有“南湘雅，北协和”的说法，20世纪现代医学的发源地和聚集中心其实是在上海。教会的仁济、广慈、公济医院是中国近代医院的起源；1907年，华人红十字总会及总医院建在上海；1914年，颜福庆创办了中华医学会，自任会长，也在上海；上海缺的是华人自己的医学院和医院。颜福庆认为上海和江、浙地区丰富的人才、资金和文化资源，一定能够再建一座国际一流医院。1928年，他回到上海专心从事医学建设。这一时期，颜福庆住在上海北郊的吴淞镇，离他的出生地江湾镇不远，因为他手创的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（上海医学院）在那里。

颜福庆在上海市区有固定的住宅，从长沙、北京和吴淞回来，都是住在自己家里。按照徐汇区房地产局提供的房产资料，颜福庆在1943年至1950年之

间在现武康路40弄4号居住。那就是说这一段时期之外，颜福庆还有别的房子居住。然而，从《颜惠庆日记》记载的情况看，颜福庆在法租界的住处至少在1937年至1950年之间没有更换过。也就是说，颜福庆住在福开森路的年份要长得多。颜福庆的堂哥惠庆，一直是住在“越界筑路”的愚园路上。1937年“八一三”抗战爆发后，沪西地区各方势力的暗杀、绑架案件非常多，颜福庆只得躲进法租界。颜惠庆想和福庆住得靠近，看中了“福开森路的房子，愿出95000元。房子和4亩地皮是元芳公司的产业，他们要价4100英镑”，只能作罢。1939年5月18日，颜惠庆搬进了法租界。5月23日，日本军警果然就搜查了他在愚园路的住宅。颜惠庆租了福照路（今延安中路）955号，离开堂弟福庆的福开森路24号（即今武康路40弄）住宅仅一公里，于是两兄弟相濡以沫，你来我往，上海和全国的各界名流都在这两间别墅里会面、聚餐、开派对，成为抗战期间法租界里的两个热点。

战争期间，法租界的生活还是相当稳定的，基本生活一切正常。今天看来很令人吃惊的是，做过总理的颜惠庆，几乎天天在霞飞路上散步，与民人无异。1944年10月22日《颜惠庆日记》记载：颜惠庆和妹妹在国际礼拜堂做了晚礼拜后，和颜福庆一起步行回福开森路住宅。“去教堂做礼拜，同福庆、妹妹去福开森路。”那时候，颜德庆刚刚得了重病，兄妹们在教堂里为他的健康做了祈祷，然后回家商议治疗方案。一旦住过了法租界，很少有人愿意离开，1948年6月22日《颜惠庆日记》记载：颜福庆曾邀请堂哥和他一起到法租界外的中山医院去建造住宅，颜惠庆却不愿意离开。“福庆来访，我拒绝了他关于在枫林桥地产上造房的建议。”颜惠庆喜欢法租界整洁优美的街区，最喜欢在霞飞路（今淮海路）上

宝贝
(纸上作品)
陈坚

母亲不识字

李新

母亲不识字，也就谈不上有文化，可她出生在文化之家。我的外祖父是方圆几十里有名的教书先生，真所谓“打席的没有席盖”，外祖父教人家的孩子一辈子，自己的子女没几个识字的，据母亲说，我大舅的学问好，可在三年困难时期，我大舅一家死得光光，那年代，学问确实不能当饭吃。

母亲也确实识得几个字的，我小时候，母亲会指着我的语文课本，说这是个“一”字，这是个“大”字，这是个“人”字，我说：“你怎么认识这些字？”她说：“当年你外老爷教学生的时候，我就在旁边看，时间长了我就认得这些字。”但母亲不会写。母亲常常把带单人旁的字说成是个“个”字，我当时不明白，后来知道了，繁体的“个”字是有单人旁的。四弟说，如果母亲受教育的活，能当大学教授。见过我母亲的一位同事说，你母亲气质好，不像农村老太太，我说：“我母亲出身大户人家呢！”

可大户人家就是命不好，我外祖父三十七岁就患破风痧去世了。我母亲67岁去世，临终前二舅在她的床前，欣慰地说：“我们都活过了爹娘。”我猜想外祖母没活过六十岁。

母亲没文化，可嫁给了一个有文化的。我父亲在做了三个孩子的父亲以后又去上了师范，回乡做小学教师。母亲心中定有个文化情结，常给我讲我父亲小时候挨打的故事，跟他的二老爷在一个床睡，二老爷让他背书，正背以后还要倒背，背错一个字就打，那手常常打得像发面馒头一样。我们后住有个大先生，是解放前方圆百里有名的私塾先生，母亲常常说起他，穿着白大褂在城里教书，可神气啦！

可母亲没沾多少文化的光，我父亲45岁那年，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病，撒手人寰。真是天塌了一半！除了姐姐、哥哥已经成人，母亲孱弱的身躯要抚养三个未成年的孩子。

从此母亲就变了。父亲留下一个半导体收音机，我把它当作半个老师，通过它我获得了许多知识，懂得了许多道理，情操也受到了陶冶，可母亲一听到它的声音就心烦，说：“一天到晚就知道听，听，听，不知道死的鬼！”我有

时候还要跟着收音机唱，莫名地又会遭她一顿痛骂。我从邻家借来长篇小说，经常因为看得人迷忘记做事情，必然会惹得母亲一番唠叨。

可母亲对有知识的人还是十分尊敬的。母亲回娘家必然会经过我的母校，也是哥哥的母校，她说有个吴先生会问她：“你是李立的母亲吗？李立是个好孩子。”李立是我哥哥的名字。她说的吴先生是女的，教政治的吴蓉娇。称女教师为先生，那是修养的标志。

我们的日子到我上高中的时候变得更加困难。我每天做功课要到半夜，伴随我的是一盏昏暗的小煤油灯，可煤油紧缺，要凭票供应，再说，买煤油要花钱，时间长不了，母亲会唠叨：“每天点灯熬油要到大半夜，反正不花你的钱！”那时候大学难考，有同学复读了八年还是考不上，我们农村条件差，生活艰苦，农村中学的师资也很成问题，光学真是看不到曙光的，母亲常常劝我：“为什么非要走那条路呢？干什么不吃饭，你看人家熬，一个大字不识，不照样一个月拿一百多！”她说的熬是我本家大伯，在煤矿挖煤。

我最终没有按照母亲的话终止学业。1982年，我终于考上了大学。一开始母亲并没有十分激动，觉得考上了我就可以从穷窝飞走了，与她无关了。可几天后她为我向银行贷款凑学费，信用社的人说：“贷给你，贷给你，你苦日子快熬出头了，培养出个大学生！”母亲顿觉脸上十分有光，逢人便说：“俺儿子在过去是状元哩！”

其实我并没有给母亲带来多大变化，她依然贫苦，健康也每况愈下了。我曾经接母亲到单位住一阵，她常常由我想到我的父亲，感到教书辛苦，“上课的时候肝肠肚肺都动颤。”教书之余，我爱写点东西，母亲心疼地说：“那要费多少脑子啊！”由此我想到李贺的母亲说的一句“这孩子非呕出心来不可呀！”

后来，母亲因为急病发作而住进医院，同病房一位老太太，母亲向我介绍说：“你这位大娘的儿子也是写诗的。”第二天我见到这位大娘的儿子了，是山东诗人马恒祥。



“老君眉”与“万艳同杯”的英译

陈默

《红楼梦》有两个英译本影响广泛而深远。一是大卫·霍克斯（David Hawkes）的译本。大卫·霍克斯是英国著名汉学家，1970年，霍克斯与企鹅出版社合作翻译《红楼梦》，霍克斯翻译了前80回，分别在1973、1977、1980年出版了英文版《红楼梦》分册。译文书名为“The Story of the Stone”。霍克斯的翻译，大大推动了《红楼梦》的海外传播。

另一个英译本由杨宪益和戴乃迭合作完成。上世纪六十年代初，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开始翻译《红楼梦》，其间曾一度中断，于1974年翻译完成，1978—1980年由外文出版社分三卷出版，译文书名为“A Dream of Red

Mansions”。

《红楼梦》第四十一回，妙玉给贾母进上老君眉。贾母道：“我不吃六安茶。”妙玉笑说：“知道，这是老君眉。”霍克斯将“老君眉”译为“Patriarch’s Eyebrows”。“老君”指德高望重的老寿星，呈上老君眉，表示对贾母的尊重，也暗示了贾母在贾府中的声望与地位。“patriarch”在英语中的意思是“家长、族长、元老、创始人、鼻祖”，这个词，既指称年事已高的老年人，又有德高望重、受人尊敬的涵义，所以，以“patriarch”对应“老君”当属妙译。而将“眉”直译为“eyebrow”，是就此茶的外观而言，这种茶的外形如

「文汇报」
微信二维码